

方志编纂学论纲

方志编纂学论纲

黄勳拔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辛朝毅

封面设计：张永齐

责任技编：黎碧霞

方志编纂学论纲

黄勋拔 著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佛山市创立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厂址：佛山市石湾忠信路9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印张 250,000字

2000年7月第1版 2000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ISBN 7-218-03400-4/K·753

定价：20.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序

勋拔同志是我国方志战线的一员老兵，长期以来担任广东省地方志编纂组织领导工作，为广东省地方志事业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贡献。他修志经验丰富，又勤于思考，在我国方志理论园地辛勤耕耘，也做出了出色成绩。最近，他在已有成绩的基础上，又推出了一部方志理论新作《方志编纂学论纲》，这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

勋拔同志的新作主要是论述新编地方志编纂理论与方法的著作，但是，与一般方志编纂学著作不同，它把论述方志编纂学基本理论与系统地总结本届修志经验紧密结合在一起，带有较强的反思性、议论性。通读全书后，你会感到，这是作者在多年修志实践中，对一些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冷静观察，深刻思考，精研熟虑后的产物。它凝聚着作者十多年来修志实践经验的智慧结晶；是一部富有功力、特色和创意的著作。

总结和反思本届修志经验教训这一特色，贯穿于全书，但是，在论及一些重大理论问题或争议问题的篇章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也往往是本书中较为精采的部分：论据扎实，分析透辟，纵横议论，精义迭现。如关于志书质量问题一章，在志书质量诸标准中，强调真实性、信息量和学术品位在衡量志书质量高低中居较重要的地位；在论述真实性问题时，强调记述事实要真

实、准确，还要全面，不能只记成绩，不记缺点；只记过五关，不记走麦城；在论述信息量（这是作者最早引入方志界的）问题时，强调不仅要注意信息量，还要注意信息密度、有用材料和无用材料；在论述学术品位（这是浙江魏桥同志较早提出，后来为各地较多同志使用的）问题时，旁征博引，探索加强志书学术品位的途径和衡量学术品位的指标等等，都显示了作者的识力功力。再如，关于政治运动的记述一章，明确主张对历次政治运动必须实事求是地加以记述，来龙去脉要讲清楚，不能回避工作中的失误，不宜笼统地提倡“宜粗不宜细”，同时又指出，由于一些政治运动与当前贴近，未经历史沉淀，具有一定的敏感性和复杂性，在记述时要讲政治，注意政策。实事求是是不等于不看条件和影响，什么都写。在确有必要时，某些问题、某些情节留给后人去写是难免的。话似平常，却寓义深远，有厚重的历史感。这些，都是既反映了方志界的一些共识，也是作者独立思考的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进行总结和反思时，立足点较高，视野开阔，努力把握时代、社会发展脉搏，运用党的理论、纲领、路线、政策分析本届修志的得失和趋向，具有较强的改革、创新意识，这也是本书的一个特色。这次阅读作者文稿材料中关于地方志功能部分时，不由得回忆起 1987 年作者发表的《论地方志的功能和志书的改革》一文。时值各地修志工作初起，发表文章或讲话一般都是大讲地方志的种种长处，但作者却在该文开门见山地指出，地方志是当代社会正面临现代化信息工具和商品经济的严峻挑战和强劲冲击，并且还历数了它和其它信息工具相比所存在的劣势。当然，作者最后峰回路转，还是依据事实肯定地方志在当代仍据有不可取代的种种优势。作者的分析客观冷静，使

人有耳目一新之感，深刻地认识到地方志确有适应时代发展进行改革的必要。正是在这篇发表于 80 年代中期的文章中，作者提出了新编地方志有便于输入电脑的有利条件，应与电脑建立相辅相成的关系等观点，可谓目光犀利，具有前瞻性。当年文章中的一些思想闪光之处，经过熔炼琢磨，已成为本书的精采组成部分。

近些年来，作者把视线转移到地方志如何反映当前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领域正在发生的巨大而深刻的变化问题上。作者呼吁地方志工作者注意克服过去“左”的思想影响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一些陈旧观念，树立大视野、新观点，用新观点重新审视历史上的一些事件，努力反映我国伟大变革时代出现的新事物、新情况、新问题，并列举了在经济领域、社会领域应当记载的一些具体事例，要求对新编地方志进行改革、创新，以适应反映这些新事物、新情况、新问题的需要。本届修志之初，胡乔木同志曾大声疾呼，“要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材料，继续编写的地方志”。所谓的“三新”是当时修志的一项指针，当时多从新旧社会、新旧时代的观点、方法、材料上的区别来理解。现在看来，至少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编修新方志的整个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一个不断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和现代科学最新成就，审视和反映我国和世界所发生的巨大发展和变化的问题；不断地对新的修志实践经验加以总结，并适应新的形势对已有经验加以发展、创新的问题也依然存在。因此，“三新”的思想不能说已经过时。当然，如何记述当前的发展变化是一个复杂问题，还要作很多深入的探索工作。作者及时提出这一问题，做了实际的努力，并贯彻到本书的论述当中，这是非常宝贵的。

由于本书是一部关于新编地方志编纂基本理论的著作，上述

总结、反思本届修志经验，探索进行改革、创新的工作，都必须结合论述地方志编纂理论的要求来进行。这对作者来说，带有一定创试性质。因为这里所说总结经验教训，固然也包括对一些具体问题、具体做法作出分析判断，但更主要的是在一些宏观、重大的问题上进行总结反思，并把总结、反思的结果熔铸到各有关篇章中去。这就要求突破过去这类著作常出现的“原则加事例”的做法，对已取得的认识要作进一步的拓展和深化，并且仔细剪裁安排，避免重复琐细，困难可以想知。好在作者经验丰富，见识高明，使有关问题都得了到较好的处理，而本书也获得了一种新的面貌和气象。内容更加丰富饱满，材料更加生动具体，概括性、论述性更加强化，有创新意义的部分也更加突出，特别是有些在其它同类著作中没有接触到或谈得很不够的重要问题，在本书中得到较充分的展开。关于志书的选材问题在本书中被列为专章就是一例。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古人在评价志书时，就把“鉴裁精当”作为最佳志书的一条重要标志。鉴裁主要属选材范围。如何鉴裁精当古人没有说。作者则作了专门论述，认为“志书的优势在于资料，在于资料的全面、系统（覆盖面大）、真实、连贯、集中（信息密度大）、地方性、易检索、易扩散（使用），能多层次、多角度提供县（市）情资料。志书质量高低，有无价值，有无生命力，主要看资料。资料残缺、价值降低；资料错误，甚至会贻误后人。但是资料的概念很笼统，数量很庞大，因此，选材问题特别重要”。同是一本 100 万字的县志，由于选材不同，内容有很大差别。这样一些篇章，增添了本书的光采。

本书涉及方面众多，有些还属于作者的建议和设想，其中有些问题也许会引起方志界一些同志的讨论，我想这是作者所企盼

和欢迎的。还有一些作者覃思终年的问题，本已准备就绪，但由于时间原因，只能暂阙。尽管如此，我认为这是一部比较全面地论述新编地方志编纂学基本理论和方法的著作，是一本很有特色和新意的著作，一本成功之作。本书文学简炼，论证严密，很少谈课题以外的话。但是，细心的读者通过阅读全书，不难感受到其中蕴含着—位老地方志工作者对新编地方志工作的深厚感情和对新编地方志事业在新世纪会取得更大发展的深切期望。我想，它不仅可能作培训地方志人才的很好教材读物；而且，对于那些想了解本届修志的艰辛、深入研究本届修志经验教训的同志，对于那些正在为续修下一届新志进行准备的同志，也会是一本很好的参考读物。读过本书的同志，是会从中得到一些启发和灵感，甚至，如果不算讲得太离题的话，也许还可以取得一点为新编地方志事业奋斗的力量和信心呢。

勋拔同志寄来新作文稿材料嘱为写序。为人作序实难胜任，只能把读后的感想写下来，请勋拔同志和读者同志指正。

高德

2000年3月2日

目 录

序	高德 (1)
第一讲 地方志的起源和发展	(1)
第二讲 地方志的性质与功能	(22)
第三讲 志书的体例	(50)
第四讲 资料的收集、整理和考订	(85)
第五讲 地方志的选材	(101)
第六讲 地方志的写作	(129)
第七讲 总述、综述的写法	(158)
第八讲 大事记的写法	(170)
第九讲 政治运动的写法	(183)
第十讲 人物志的写法	(196)
第十一讲 专志的写法	(209)
第十二讲 关于提高志书的质量问题	(225)
第十三讲 当代方志事业	(251)
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出版物上数字 用法的规定	(272)
年鉴编纂基本知识	(283)
后记	(310)

第一讲 地方志的起源和发展

一、地方志的起源

中国编修地方志，有悠久的历史。现在保存在国内的旧志，有 8700 余种，11000 多卷，这是一笔极其宝贵的财富，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所不能比拟的。

地方志是由春秋战国时期的国别史、地理书和地图融合而成的。

（一）地方志的起源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国别史

我国从远古就重视历史记载。公元前 8 世纪周朝建立以后，为了加强王室的统治，中央及诸侯国都设立史官，负责记言记事。史官记录下来的言和事编纂成书，便是一个诸侯国的历史。

周朝设五史，即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

《周礼·春官》载：外史“掌四方之志”。即掌管王畿以外各诸侯国的典籍，并负责整理给诵训官。又《周礼·地官·诵训篇》“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郑玄注：“该四方所识久远之事，以告王观博古所识。”即诵训官将外史提供的“四方之志”，向周天子讲说。

汉代学者郑玄认为：晋《乘》、楚《檮杌》、郑《志》、鲁《春秋》等即“四方之志”，是记载各地情况的。孔子周游列国，

“得见百二十国宝书”，可见当时国别史不少。因为诸侯国实际上是一个地方（邦、域，古代域、国共用），所以，这种最早的“国别史”是方域之史，不同于以后历代封建王朝的“国史”（如《史记》、《汉书》），具有区域性。因此它具有今天意义上的地方志萌芽性质。

历史上有许多学者持这个观点。宋朝的学者郑樵说：“古者，记事之史谓之志。”清代学者章学诚也说：“方志之由来久矣，……余考之于《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若晋《乘》、鲁《春秋》、楚《梣杌》之类，是一国之全史”，“郡县志乘，即封建时列国史官之遗。”近代学者梁启超说：“最古之史，实为方志。”

以上这些历史上有名的学者认为，地方志源于史，这是对的，但单这么说还不够。

（二）方志又导源于古代的地理书

地理一词，最早见于《周易·系辞》：“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东汉王充解释说“天有日月星辰，谓之文，地有山川陵谷，谓之理”。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记载关于地貌、物产及传说等的专著，《山海经》和《禹贡》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两部。

《山海经》是我国最古老的一部地理书。据考订，其中14篇是战国时的作品。《山海经》内容包括《山经》、《海经》、《大荒经》三部分，其中《山经》成书最早，记载也最丰富，全书以山为纲，以方向与道里为经纬，记载山川、动物、植物、药物、矿物、民族、祭祀、巫医等，保存了不少远古神话传说，对研究古代历史、地理、民俗、文化、神话等均有参考价值。

有人称山海经为“神怪之祖”、“小说之祖”、“中国医学发展

的源头”、“中国地理学的源头”、“中国方志的源头”。

司马迁说“《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史记·大宛列传），鲁迅说“《山海经》，盖古之巫书也”。

另一些人（如东汉的刘秀、晋代的郭璞、近代的顾颉刚等）认为《山海经》是科学书、博物书、地理书，英国的李约瑟赞此书为“名符其实的科学宝库”。

《禹贡》为《尚书》中的一篇，是战国时的作品，全书才1193字，作者不详。此书以自然分区方法，记述了我国古代的地理情况。它把全国分为九州（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对黄河流域的山岭、河流、藪泽、土壤、物产、贡赋、交通等都有描述，对长江、淮河等流域也略有涉及。《禹贡》被认为是我国最早的全国性区域志。

后世志书，在体例和内容上，和《山海经》、《禹贡》存在着渊源关系。

《四库全书总目》称：“《元和郡县志》（唐李吉甫修）颇涉古变迹，盖用《山海经》例。”

元朱思本撰《九域志》，也“一以《禹贡》九州为准的”（自序）。民国时期修的《佛山忠义乡志·赋税志》说：“志例有赋税名目，《禹贡》一书为赋税之祖，《周官》则兼详力役。”

（三）方志的起源与古代地图也有关系

地图又叫“舆图”。我国的舆图出现甚早，春秋战国时期，地图的使用已相当广泛。周王朝为此在中央设立了专门的官职，负责掌管各种舆图。

我国现存最早的地图为1978年河北省平山县发现的战国时期的“兆域图”。

宋朝司马光曾指出周代职方等官的职掌、作用与后世方志的关系。他在《河南志序》中说：“周官有职方、土训、诵训之职，掌道四方九州之事物，以诏王知其利害。后世学者，为书以述地理，亦其遗法也。”

以上这三种类型的图书，在发展中相互融合，演变成今天记历史沿革、记民生休戚、记百业兴衰的地方志。

从以上资料可见：

1. 地方志的起源很古远，其源头可追溯到的春秋战国时期。
2. 它不是从单一类的图书发展而来的，它是古代的历史、地理、地图融合演变而成。

这个时期，还谈不上什么方志学。但第一，已注意到方志应该“求实”，并用此评价志书；第二，已自觉地注意发挥方志的资治作用，修方志是为了“以诏王者知其利害”、“告王以施其事”。

二、历代的方志编纂与研究

（一）发展时期

1. 汉魏晋南北朝时期

秦以前已有地图。秦统一中国，因治理国家和用兵需要，十分重视绘制地图，编写有关资料。秦史记载，秦代已有图籍。

郡县制的巩固和生产文化的发展促进了地方志的发展，汉代有舆地图、计书、郡国地志等。计书是记载贡赋之类的文书，地志记载各地山川、风俗等。汉武帝曾命令各地将“计书”、“地记”按时上报，由太史掌管。东汉时有中央档案馆性质的机构叫

兰台，保存了不少各郡国的计书、地志。兰台令史班固利用兰台保存的计书、地志等材料，又吸收了前人编辑的成果，写成第一部全国地理总志——《汉书·地理志》。

《汉书·地理志》以西汉的 103 个郡国及所属的 1587 个县、邑、道、侯国为纲，在郡、县、道、邑条下，分别记录了户口数字，山川水泽、水利设施、重要的聚落、关塞、名胜古迹、地方特产、工矿及其管理机构等。

《汉志》之后，属于全国总志性质的，有东汉应劭的《十三州记》、晋挚虞的《畿服经》、陈顾野王的《舆地志》等，其中《畿服经》内容最详，分 170 卷，在地理志的基础上增加了社会与人文的内容，已初具地方志的雏形。

东汉初年，光武帝刘秀为彰乡里之盛，下令编修《南阳风俗传》。随后，以记人为主的方志逐渐兴盛起来。

魏晋南北朝时期，私修地方志蔚然成风，反映一些风土人物的各种形式的地记接踵而出，单是《隋书》收录的就有 100 多种，1400 多卷。以其记载内容分，可归纳为两大类：一为述地（专讲地理），一为记人（人物传记）。述地一类，范围很广，有专记一方山水的山水记，如《庐山记》、《罗浮山记》、《汉水记》等；有记地理风俗的风土记，如《阳羨风土记》、《临海水土记》、《诸蕃风俗记》等；有记物产的异物志，如《南方草木状》、《扶南异物志》、《交州异物志》等。《交州异物志》二卷，已佚，清曾钊纂辑刻在《岭南遗书》内。其他有记道路交通、都邑、宫殿、寺庙、冢墓、园林等等。和广东省有关的还有晋裴渊的《广州记》、南北朝邓德明的《南越志》等。

记人一类，为数更多。魏晋以后，谱牒与各类人物传记大量涌现，其中有的是各类人物合传，如《海内先贤传》。

这个时期“图经”兴起。“图经”由图和经两方面组成，是地图与说明文字的合称。

图经之名，起于汉代。现知最早的图经是东汉的《巴郡图经》（已佚）。到南北朝，图经已成为方志通用名目之一。

这个时期，出现了综合记地记人的、更具方志性质的著作，影响较大的有东汉袁康、吴平的《越绝书》和晋常璩的《华阳国志》。

《越绝书》是浙江最早的方志，也是国内现存最古的方志，有人将它视为方志的鼻祖，范文澜说它“开方志之先例”（《中国通史简编》）。该书 25 卷，现存 15 卷，记吴越二国史地，内容兼及人物、地理、都邑。

《华阳国志》12 卷、附录 1 卷，内容记述远古到东晋穆帝永和三年以巴蜀为中心的西南地区的人物、地理、历史。所记地区，相当于《禹贡》梁州之域，“华阳黑水惟梁州”，故取“华阳”国名。

此时的方志学，已注意到“求实”、“致用”。

2. 隋唐时期

这个时期，国家的统一，经济文化的繁荣，促进了方志的发展。汉代形成的图经，成为这一时期方志的主要形式，其内容与体例开始逐步趋于完善，以“志”、“记”为名的方志增多。

隋唐时期，地方志的社会作用日益受到官方的重视，封建王朝逐渐加强了对修志的控制。隋文帝开皇十三年（593 年），明令禁止私人编史，实行官修志书制度。

我国大规模有组织的纂修方志是从隋朝开始的。隋朝统治不到 40 年，但是，在修志方面做了许多事情，影响很大。《隋书·经籍志》说：“隋大业中，普诏天下诸郡，条其风俗物产地图，

上于尚书。”朝廷编有如《诸郡物产土俗记》150卷、《区域图记》1200卷、《诸州图经集》100卷等大部头，是空前的，也为以后历代封建王朝纂修这一类书创立了格局，奠定了基础。

这个时期，广东的地方志有隋樊子盖撰的《岭南地图》，已散失。

唐朝的地方志主要是图经。它编纂图经的制度比隋朝更加严密，规定全国各州府每三年（一度改为五年）一造图经，送尚书省兵部职方官那里，如有山河改移，则要及时报送。

显然，图经是从计书、地志、地图演变发展来的。如果说，过去是图是图、志是志的话，那么，图经是把两者合起来了。这是一大发展。

唐代各地普遍修图经，边远州县也不例外，在敦煌发现的唐人图经有《沙州图经》、《沙州都督府图经》、《沙州地志》、《西州图经》等多种。

此外，唐代由朝廷编纂的全国性志书有《括地志》和《元和郡县图志》。

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唐太宗命他第四个儿子魏王李泰等人撰修《括地志》。这部书后来被图书目录学者视为空前的地理巨著（550卷，又序略5卷）。《括地志》以地域（10个道、358个州、1551个县）为纲，记录各地的建置沿革、山川形胜、河流沟渠、风俗物产、往古遗迹、人物故事等。

宪宗元和年间，中书侍郎李吉甫编纂《元和郡县图志》，40卷。到了宋代，图便失传了，后人把它改为《元和郡县志》，主要记述当时全国各州县的疆域、山川、关塞、道路、户口、贡赋、物产等。它是继《括地志》以后的又一部地理巨著，颇为后人推崇。

这个时期的方志体例又有发展。不过，不论内容与体例仍详于地理而略于人文，仍摆不脱地理书的影响，仍未臻完善与成熟。

唐代地方志剧增，问题也随之暴露出来，那就是有些芜杂和浮夸。唐朝的学者刘知几说：“郡书者，矜其乡贤，美其邦族。”颜师古说，志书“妄有穿凿，安处附会，颇失其真”。

（二）成熟和繁荣时期

1. 宋代的方志

在五代十国长期动乱之后统一的北宋政权，把修志作为加强管理、巩固政权的一项措施。皇帝多次下诏修志，因此，宋代成为我国方志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在这期间，修志的组织形式及规模均超越了前代。各种方志在数量上大大增加，内容和体例逐渐趋于完备，“志”逐渐取代了“图经”的形式。自宋以后，方志发展进入成熟阶段。

宋代沿袭唐代三年一造图经的制度，规定：“凡土地所产、风俗所尚，具古今兴废之因，州县之籍，遇闰岁造图以进。”

宋代方志，空前发达。就现已知的书名统计，总共约有 600 种，大大超过了此前历代方志的总和。但是，留传下来的不多，现存宋志大约不超过 30 种，是一项珍贵的文化遗产。

宋以前的方志，详于地理而略于人文。到了宋代，方志记述的重点开始从地理转到人文历史方面，突破了原来的框框，“人物”和“艺文”在方志中逐步占居重要地位。北宋初年成书的《太平寰宇记》，集中反映了这个变化，为地方人物立传和采集地方文献开了先例。

《太平寰宇记》200 卷，是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在史馆任职